

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杜熙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治理角度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明晰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才有可能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善治是共同富裕治理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的标准,内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复杂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过程制度化以及治理评价综合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共同富裕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处理好上述各治理要素间的有效连接与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治理5个要素及其特征可知,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研究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需要以治理思维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走向合作共治是未来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关键词: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治理;善治;合作共治;人民共享;数字平台;治理主体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3)06-0001-17

收稿日期:2023-09-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YJC710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300102163609);陕西
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JZ018)

作者简介:杜熙(1987-),女,新疆塔城人,讲师,法学博士。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and basic el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DU X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stands as a crucial practice of modernized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represents an urgent imperativ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journey, demanding heightene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standards from both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A thorough grasp of common prosperity's connotations within governance and a clear delineation of its governance components are essential to chart a pragmatic course toward its robust promotion. This study posits that good governance embodie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and serves as the benchmark for assessing it. This good governance entails the principles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 subjects involved in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are diverse, the objects under governance are intricate, and the methods of governance are multifaceted. The inherent reality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evaluations underscores the necessity for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nd positive synergy among the governance elements, rooted in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ive elements constituting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reveals that prioritizing the populace's interests forms the foundational rule of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This necess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dedicated to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fostering the capacity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rough leadership in party building, innovative platforms,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In confronting the array of risks prevalent in modern society, employing governance-oriented thinking becomes imperative in addressing the diverse challenges hindering common prosperity. Embracing cooperative co-governance approaches emerges as a pragmatic and essential choice for steering the traject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cooperative co-governance; people's sharing; digital platform; governance subject

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最早使用“共同富裕”概念^[1]。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江泽民、胡锦涛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使中国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发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更是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5]。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影响深远^[6]，“共同富裕”也因此成为理论与实践场域具有前沿性的热点话题^[7]。

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8],许多学者依此将其拆分为“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9]。“富裕”是指“(财物)充裕”^[10],虽然“共同”置于“富裕”之前,但是多数学者仍然将“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中心词,强调生产力所要达到的“富裕”水平^[11],许多人也因此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富裕”民生上,倾向于用经济学逻辑去思谋解决之道,相应地,着重考虑从收入分配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政策、分配政策等则是政府的政策重点^[12]。“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3]。共同富裕并不仅仅归结为经济上

的民生实事,还有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内容^[14],尤其在“富裕”前加上“共同”二字后境界就更不同了^[15]。从实现机理来看,共同富裕的关键与难点正是怎样实现“共同”与“富裕”的递推和良性循环^[16],尤其是扎实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依然在农村农民^[17]。从这个层面看,“共同”是一个比“富裕”更紧迫的问题,“共同”强调机会、过程、公共性^[18]以及结果的公平^[19],本身有大家一起(做)联合协作^[20],以及社会正义的含义^[21],相应地会与“社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联系,多元主体的合作就构成了共同富裕的复杂系统场域^[22],有学者建议从社会质量视角,通过描绘社会整体品格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23]。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作为一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事业,共同富裕涉及公共服务、民生福利等层面^[24],而“发展”必定意味着社会机体各环节、各层面的相互促进^[25]。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也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治理主体,需要借助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才能逐步走向善治^[26]。因而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应容纳于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和认知序列中,属于治理体系的一种,倡导用“共同富裕治理”来描述中国的共同富裕事业^[27]。既然共同富裕治理属于治理体系的一种,那么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实现^[28]。故此,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实践与挑战,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迫切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创新型国家治理为依托,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因而,将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作为本研究的起点,从治理角度进一步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治理意蕴,重点围绕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开展研究,深刻认识并理解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优势和力量,找准整合四者之间的关系平衡点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可以认为,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厘清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需求之所在。

一、共同富裕治理的内涵

作为一项全社会的整体性事业,共同富裕广泛涉及公共服务、民生福利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属于治理体系的一种,因而用“共同富裕治理”来描述共同富裕事业是自洽的。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善治”即“好的治理”,是治理的总体目标与衡量标准,意味着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公共事务,本身就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实现共同富裕和善治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佳形态,而从共建、共治、共享理解共同富裕治理的含义则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善治的前提。

(一) 共建:共同富裕治理的现实基础

“共建”意味着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现实主体获得实在利益、实现幸福实践的历程。“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9]。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除了依靠全

体人民努力奋斗之外,根本无捷径可走。当初“一穷二白”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努力创造。如果一个社会充满“躺平者”,人人幻想“躺赚”的生活,勤劳致富的社会风气将受到破坏,共同富裕也只能成为空谈。因此,共同富裕应由全体社会成员集思共创,共同富裕治理的体制机制要由全体社会成员群策构建。

共建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础。当我们把共同富裕看成一项治理事业,将“治理”思维融入共同富裕时就会发现,共同富裕治理实践遵循的是公共管理领域从“统治”走向“治理”的宏大趋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般性大趋势。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实践后就坚定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可以破除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的束缚,实现从“政府统治”到“社会治理”的社会结构变迁及规律走向。而且“共同”意味着社会财富惠及的是全体人民,全体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过去单一治理范式在治理的主动性、政策的靶向能力和治理主体的反应能力方面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向往。“共富”社会的建设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当今民众对财富创造的制度建设与完善,对社会提供创富服务质量的需求远胜以前任何时期。调动全体人民的历史伟力,形成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与体制机制,汇集各方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并加强协同,才能放大共同富裕治理的价值。

(二) 共治:共同富裕治理的实现路径

共治是共建基础上的共同参与治理。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30]这种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光荣传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了强大动力。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共治”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强调以人民意愿为基点的人民主体地位。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政治合力基础,党是人民治理国家制度体系的建构者,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历史和社会条件。党是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根本利益的发现者和表达者,替人民发出“共同富裕”的心声,但党无法替代人民本身去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人民才能在共同富裕实践中找准方向,实现“善治”。

共治是对共同富裕治理成果的直接保障。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共治”作为具体环节植入共建与共享两端之间,共治作为一个独立环节得到强化,突显了治理的过程性。从某种程度上讲,“过程”本身就是治理最大的特征,各种矛盾、冲突、机会在过程中出现,治理成果也在过程中生成^[31]。共同富裕治理过程的“共治”依赖各治理主体共同维系、协同推进,强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进行共同富裕治理的民主化与制度化。因此,在共同富裕治理过程中重视体现“人民主体性”的“群众路线”就显得必要且紧迫,这意味着需要赋予社会一定的权力,鼓励其

主动参与共同富裕过程,并通过协调方式推动共同富裕治理目标的实现。而“制度化”则要求各治理主体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合法公平地创造财富,尤其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治理念”^[32],以完善社会公平的法律制度护航高质量发展。总之,以“民主”和“法治”为抓手的共同富裕共治既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又通过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了共同富裕治理效能。

(三) 共享:共同富裕治理的最终目标

共享是共建和共治的目的。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若革命的市民们”“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最终会导致革命失败^[33]。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达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信任和支持主要源自政党对人民群众利益重视与肯定。正因为资产阶级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阶级”^[34],对人民利益的重视让无产阶级必须选择“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35]。其实,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建享分离”时就已经带出了社会主义“共建共享”分配原则,即共建者因为贡献了劳动与智慧就应该获得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回到多元治理主体参与问题时不难发现,多元主体愿意参与共建共治并不是无源之水,当社会主体能够共同保有和转化治理资源、治理利益与治理“红利”时才会可持续地投入共建共治中,因而“共享”实质指向的是分配问题。只有充分的共享,才会令多元主体认同并积极参与治理,才有可能形成共

建共治的治理格局。

新时代共同富裕治理的“共享性”在动态调整中逐步优化。新时代共同富裕治理的“共享性”正在由部分“共享”向全面“共享”转化,即共同富裕治理的成果既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领域,还要涉及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等精神层面,由此观之,“全面共享是发展权利、发展条件与发展成果共享的统一”^[36],系统维护和保障了全体人民利益和权利。在共同富裕治理中,发展权利共享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共同致富的权利,人民获得财富的权利是公平合理的,而且在保障“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还要重视少数弱势群体的权利。再者,发展条件共享要求在共同富裕治理过程中应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障其自身发展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为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存在先天性发展能力差异,同时社会给予的个体发展条件也不尽相同。共同富裕治理的重中之重在于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即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不能被少数人所掌控,必须让全体人民都吃上中国社会发展成果的“蛋糕”,尤其要对发展弱势群体、偏远地区给予政策性倾斜,让全体人民共享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不是让小部分人受益。

二、共同富裕治理的五维要素分析

作为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治理本质上是各治理要素间的连

接与互动。相关研究表明,高水平的治理绩效来源于多治理要素的组态耦合^[31]。因此,深刻理解共同富裕涉及的治理主体、治理问题、治理手段、治理过程以及治理评价等治理要素及其特征有助于保持共同富裕治理结构的稳定与均衡发展。

(一) 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市场关系的连续调整、在注重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结构特征的情形下推进的^[37],这种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作用,意味着党和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市场、社会、公民个人都将拥有治理主体的地位。

第一,党委。“党的领导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建构了系统的制度体系”^[38],但党的领导作用不是直接管理和干预,而是扮演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角色。各级党委主要负责的是共同富裕制度制定、远景设计,推动党关于共同富裕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第二,政府。政府作为共同富裕多元治理力量的整合者,在党建引领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依托国家统筹力量将市场和社会纳入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范畴,通过制度设计统筹安排,确保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能够均衡、公平地占有社会财富。同时,政府监督者的角色以有力的法治保障和赋能共同富裕治理主体有效维护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秩序,保证了各治理主体参与共同富裕治理的

有效性。

第三,市场。市场竞争激发了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欲望和动力^[39],但以市场为主导的初次分配存在固有的不平等性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自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政府引导共同富裕各治理主体合法追求正当利益,从而保障共同富裕治理顺利推进。

第四,社会。社会组织在整合社会力量、发挥专业技术、动员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尤其是汇聚了社会各行业领域的经济类社会组织,有利于推动经济产业发展。同时,其社会领域的公益性价值还能弥补政府与市场存在的缺陷,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共同富裕发展。

由此观之,从治理主体视角来看,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指参与共同富裕治理的主体多元,更强调的是在面对和处理共同富裕治理难题时各治理主体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发挥出来的比较优势。不同治理主体在参与共同富裕建设中形成了一种线性关系与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共同富裕治理主体结构。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元主体协商、识别、分析、监测、评估共同富裕治理难题的过程就是共同富裕治理推进的过程。

(二) 共同富裕治理客体复杂化

治理客体即治理的对象,也可以理解为治理面临的问题。共同富裕治理的客体是引发共同富裕难题或困境的公共事务以及各种人类活动和行为,包括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民众行为。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能够激发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信心,但是也需要对现阶段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有清晰的理性认识。

1. 相对贫困问题是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40]由此可知,接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延续、升级与深化^[41]。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更加隐蔽,治理难度更大。因而有学者指出,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性举措,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提高相对贫困治理能力^[42],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完成。“相对”两字反映了地区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暗含了当前相对贫困治理多维度、多场域的结构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共同富裕就是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43]。不论是共同富裕,还是将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引领的相对贫困治理,单纯依靠政府和市场都存在缺陷,需要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在动员全体社会成员的基础上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的有机结合。

2. “社会”逐渐成为共同富裕治理领域

新时代共同富裕破解的是通过优化社会结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结构性制约^[44],满足的是民众普遍的利益关切,能够为民众所广泛认同和接受,毕竟“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45]。小康社会建成后,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会达到一个新高度,能否持续“富裕”,尤其是能否“共同”富裕,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在于,多数人习惯将“富裕”作为思考问题的重心,作为一种发展实践,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机体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以及各种成分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即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方面的均衡发展。人们仅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不能算是共同富裕。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共同富裕的关键或者难点应该更加凸显“共同”。因此,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更应关注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不断激发“社会”的活力,调整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保障共同福祉、增进社会团结的目的。相应地,“社会”应该成为当前共同富裕治理的一个重点。

(三) 治理方式:多样化

治理方式解决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一般涉及治理主体、客体以及治理工具的选择。由前述可知,共同富裕治理主体逐步多元、治理客体复杂化,依靠单一治理方式难以涉及并保障各方参与共同富裕治理利益,单纯的行政手段更是难以应对共同富裕面对的复杂问题。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三治结合”被证明是一套在协商与互动中消解困境的多元化与综合性的有效治理方式。社会转型背景下“三治结合”对共同富裕治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一,“三治融合”是激活共同富裕治理的强劲动能。“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

心”。“三治融合”并非三种治理方式的简单叠加,也非三者按照各自治理逻辑各行其是,而是三种治理方式融合为一个有机治理体系。“法治”和“德治”的工具性色彩较为突出,而“自治”除了具备工具性特征之外,还蕴涵着主体性意蕴。共同富裕治理实践离不开全体人民的自治活力,只有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促使群众的自治基因活跃起来,才能激发其参与共同富裕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活共同富裕治理的社会动能。但是离开法治,自治和德治可能会因为失去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政府监管体系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外在约束保障作用而出现共同富裕自治失序、德治式微。当然,如果缺少德治,共同富裕的自治和法治则会因缺少相应的文化浸润而缺少共同富裕治理的精神内核、提升治理成本。可知,自治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治理方式,法治是保障共同富裕治理的“硬约束”,德治为参与共同富裕治理的各主体提供价值引导和精神塑造。需要强调的是,在推动共同富裕自治、法治和德治发展的同时,加强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构建一体多元的面向共同富裕治理形态是新时代共同富裕治理的重要内容。

第二,依托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自治、法治、德治”。政党推动国家与社会相连,是连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组织^[46],保障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与社会意愿自下而上的表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各种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形成统一意志推进国家

治理^[47]。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突破了国家-社会结构下治理效能弱化的桎梏^[48]。党的领导整合了共同富裕治理的“自治德治法治”,通过组织、整合、协调党的领导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共同富裕“自治”的核心功能、“法治”的保障功能和“德治”的基础功能,以及“三治”内部互动与融合,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主体关系。作为治理政策转化为治理行动“转换器”的党组织,在共同富裕治理实践过程中,引领多方力量进行“自治、法治、德治”,以明确的政治导向平衡好行政化资源与市场化道路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共同富裕善治意在探求政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良性互动,通过组织引领、社会参与将规范性、整合性的政党因素嵌入“三治融合”的共同富裕,能够使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达致党的领导与“三治融合”的有机统一,从而促进共同富裕治理动力的内在生成,确保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第三,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自治、法治、德治”的整体效能。当今,数字技术正多场景地嵌入治理领域,日益成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通过数字化工具赋权增能数字价值,尤其当数字技术嵌入当代经济社会活动,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基础。如数字平台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丰富了当代社会大众创新创业的途径与发展空间,激发了劳动者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热情,有助于做大“蛋糕”。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平台和数据资源使

共同富裕智治成为可能,同时推动了共同富裕“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发展,综合赋能共同富裕治理效能的提升。如当下出现的大量淘宝村,正是农村使用互联网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典范。数字化背景下,农户和涉农企业依托互联网,是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和服务农业生产的主体和主力,政府调控和服务于农户和涉农企业,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市场龙头企业、电商扶贫等形式实现村域内的优质农副产品外销。数字化技术能够汇聚、融合各类数据信息,吸纳更多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共同富裕治理当中,形成人人参与乡村共同富裕治理新局面,在推动乡村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方面效果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自治、法治、德治”的整体效能。

(四) 治理过程:制度化

治理过程制度化强调在多个治理环节上建立或完善相应制度,针对的是治理主体在部分事务上决策和裁量的随意性,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主体利益和权利不受损害,确保实现公平治理。倡导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的目的在于推动共同富裕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以及治理方式不断走向现代化,提升共同富裕治理整体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方向。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为了防止改革成果为少数人所独享,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改革“不是实现少数人的私利,而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成

果”^[49]。当涉及一些改革者自身利益时,必须凝聚起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并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使全社会更好地认同和接受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不会因为个人偏好改变而改变。由制度形构的稳定社会秩序与社会力量推动现实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50],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保障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努力过程中不偏离航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各类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质上都是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成果的具体体现,为中国实现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有助于激发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的动力。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美好蓝图和新型治理理念,一经提出就具有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作为中国发展的一项中长期目标和系统性工程,不能仅将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理念和目标来激励全体社会成员。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靠空想实现的,而是真正“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现实运动过程。众所周知,制度造就了此框架中人们行为的动力、规范及其独立存在的形式^[51],共同富裕治理制度化通过制度上的除旧布新,依托制度的存在及其功能,激励和调动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积极性。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让全体人民感受到“共富”时代即将到来,改革原有侧重追求效率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的体制机制,构建实现共同富裕价值共识的制度符合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要求。只有建立健全共同富裕治理的体制机制,如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惩处机制、引导机制和执行机制等,进一步畅通全体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普通人创造合法致富机会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 治理评价:综合化

治理评价主要用来科学分析治理是否有效、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主要目标是提高治理质量。对于共同富裕而言,共享是其最终目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与创造,最终也应该回到人的目的性上。因而对共同富裕治理的评价需立足于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两个方面去评价共同富裕治理的效果。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共同富裕治理的过程也是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进步的过程。如果一个社会只重视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就容易造成将共同富裕缩小为生产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关系问题,导致无法有效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此,对“富裕”的理解就不能仅局限于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而是统筹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等文明的全面跃升。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是共同富裕社会治理评价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共同富裕是一个经济社会整体协调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发展不是社会某一个方面的高度发展,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全面综合发展、高度协调统一的状态^[52]。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更为

负责任地发展应该是共同富裕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因而共同富裕治理的评价应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内容在内的治理评价体系,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内容,共同富裕社会治理评价都是不完整的。唯其如此,构建系统性共同富裕社会治理评价体系,才能为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结构性保障,这是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现代社会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和支撑条件。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效能的核心指标。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对政治参与、精神丰富、生态良好、生活美好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与以往相比更加明显,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难题,也因此成为共同富裕治理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重点。因而共同富裕治理评价是否到位就是要看人是否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包括在经济、政治、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幸福感、获得感是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就回到了对人本身发展的关注,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遵循,更是对全体人民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创造性和重要性的理解与尊重。

三、基于共同富裕治理内涵与治理要素的结论和启示

结合前文对共同富裕治理的论述,本文

界定了共同富裕治理的内涵,深入分析了共同富裕治理5个基本要素及其特征,主要结论和启示如下。

(一)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

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持续走向并实现善治的渐进过程^[53],共同富裕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具体生动实践,必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至上作为恪守的基本遵循。

1. 为了人民:共同富裕治理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却发现自己“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54]。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永远不能让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5]的社会主义却能做到。共同富裕自诞生之日就早已内嵌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自身既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又能引导和规制资本服从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6]。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共建共享共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发展目标充分显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也暗含了要以更充分平衡地政治发展来积极地服务于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57]。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的制度设计是围绕“为了人民”而展开。不论在决胜脱贫攻坚进程中,还是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治理体制机制始终围绕实

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设计和构建,在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中对人民负责,体现人民意愿,落实人民期盼,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共同富裕治理的根本目的。

2. 依靠人民:共同富裕治理的动力

“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活动”^[2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58]。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人民群众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也因此是共同富裕治理的主体。共同富裕治理依靠人民,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也回应了共同富裕治理的动力和机制问题。由于治理过程更多地是一个运作机制及其动力的问题,治理动力本质是治理力量的作用表征,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治理主体上,其自身内在规律性要求治理主体需要具备一系列能力和素质,否则会影响到治理效能。人民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自2020年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后,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效能是实现共同富裕治理目标的必经之路。有数据表明,大多数相对贫困者自我脱贫参与能力不足^[59],而贫困者自我脱贫参与能力弱化的本质是贫困者获得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等关系民生的实质权利缺失导致其参与能力下降。因此,我们要顺应民众对各项民生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与期盼,实现“作为财富生产的人”和“作为财富发展目的的人”辩证统一,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共同富裕治理中创造,在创造中获得尊严和体面。

3. 人民共享:共同富裕治理的落脚点

“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0]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人能够全面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但是这一切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前提,人的自由程度始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保障人民群众拥有丰富的社会财富,消除贫困是实现人民共享发展的前提。共同富裕治理将人民共享作为落脚点,说到底就是通过“有效治理”为个体参与共富实践创造机会,让个人理想抱负在公共治理领域实现,让社会各阶层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明确了共同富裕治理的主要目标,强调的是治理过程中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共同富裕意味着一定社会共同体中的人普遍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公平的、合乎正义的,这就要求在共同富裕治理的所有环节中,要有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共享机制,即物质财富共享机制和非物质财富共享机制。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共享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殷实富裕的美好生活;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共享机制,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充盈起来,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融洽,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二) 增强主体能力,加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建设

根据前述可知,以实现“良好治理”为最终目标共同富裕治理内含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善治”要求共同富裕在治理方式与治理过程上不断推动共同富裕治理

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使共同富裕在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结果等方面呈现出“良好治理”状态。其中人是制度变革的主体,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治理遵循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选择,因而更加注重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

1. 以党建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建设合力

政治引领和整合的根本在于获取认同与凝聚社会,关键在于党组织、党员和民众等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把党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环节,能够有效整合各方面力量,打造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党的组织体系深入基层的背景下,党建是共同富裕的“红色引擎”,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治理的重要特征^[61]。尤其是“网格+党组织”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强化党组织引领作用、统筹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共同富裕治理指明正确方向。这张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织”成的“共同富裕治理网”,保障了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能力、福利水平和发展机会,人们的共富心愿可以被“听到”“看到”和“回应”。质言之,抓好党建能够激活共同富裕多元治理主体,激励其作为,使其成为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凝聚、整合共同富裕多元治理主体的力量。

2. 以载体创新推动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协同建构

治理载体关系到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解

决治理问题(治理客体)的路径和方式。共同富裕治理载体将共同富裕治理各项工作融为一体,创新共同富裕治理载体有助于把握政府、社会(个人)、企业三者的优势和力量,从而做好共同富裕治理各方面、各层次规划,协同建构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由多层级政府、市场构成多元主体的网络化共同富裕治理载体逐渐推动“三轮驱动”的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协同建构,治理的主体不仅是单一的政府,市场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力量,但共同富裕治理不仅需要政府有的放矢和市场的活力释放,更需要社会机制对共享理念和奉献意识的践行。这些载体形式可以是组织载体、平台载体和规则载体等,如社区慈善公约、民生议事会、推动共同富裕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共同富裕治理中的载体创新通过提供治理平台吸纳更多治理主体参与,使多元治理主体有更多的空间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能动性,也使共同富裕治理提质增效,从而从整体上推动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协同建构。

3. 以技术运用提高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整体效能

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共同富裕治理效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倒逼治理主体能力提升,加强了共同富裕治理主体之间互动,提升了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的效能。例如,数字平台以全新生产方式拓展了普通劳动者对接市场资源与社会需求的通道,自媒体、直播带货等新型就业方式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用数字平台发展方面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共同分享改革红利与

社会发展成果。从劳动主体方面来看,越来越多的数字时代劳动者开启了依靠知识与能力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新阶段,劳动内容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劳动途径从现场单一途径向线上线下相结合转变,这些转变意味着合作共享的发展新趋势。再如,在公共服务方面,将智能化和网络化数字技术赋能基本公共服务技术,有助于打破部门与层级间的数据壁垒,弥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有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数字平台、新兴级数赋能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信息技术融入基层治理的体现,广大劳动者因此能够更快获取信息、更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更好地享受劳动成果。同时,也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数字素养,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的本领与能力。总之,共同富裕治理中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治理工作更加高效,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效能得以提升。

四、结语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的事实时刻提醒着人们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面对诸多风险,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决定了单一行动主体难以在风险社会中独立生存,需要多元主体协调协同、合作借力,而这也是治理思维追求使然。因而用“共同富裕治理”来描述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并找到实现路径是恰当且合适的。共同富裕治理内含了共建共享的发展意蕴。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实需求迫切需要能够强力支持困弱群体为

己任的政府、有较强致富能力者的“先富者”、以及有善心的公益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来支持并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些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后富者”(低收入者、困弱者)变为富裕者的“有为”、主动作为的艰难过程。如前所述,理论上,在共同富裕治理过程中,党和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在参与共同富裕建设中形成了一种线性关系与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的共同富裕治理主体结构。现实情况是,部分人还是会产生“政府需要包揽一切”的误解,而且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在短期内也难以克服“马太效应”等带来的影响而平等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完善共同富裕制度设计,在不断总结机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共同富裕治理主体的价值共创与通力配合。因此,共同富裕治理是以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为基本原则的,一方面各治理主体需要从各自的角色定位出发,明确自身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权力与地位,通过履行各自责任为共同富裕治理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主动加强与其他主体的协同合作,创新政社互动模式,完善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才能做大“蛋糕”^[62]。这就对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各地政府在主导共同富裕治理的同时,以激励为手段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的互动,为各治理主体提供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建设,因而走向合作共治是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尤琳,罗志强.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背景要素、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J]. 科学社会主义,2023(2):114-121.
-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5]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6] 蒋永穆,谢强.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1(4):15-24.
- [7] 刘方平,黄陈晨. 2035年共同富裕之明显实质性进展的阶段、目标及其实现[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54-164.
- [8] 欧健.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度基础、制约因素与实现机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5-26.
- [9] 何植民,蔡静. 元治理视域下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行动框架[J]. 行政论坛,2022(5):22-28.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1] 蒋永穆,豆小磊. 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6-29.
- [12] 郁建兴,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 政治学研究,2021(3):13-25,159-160.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4] 方世南. 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价值和路径[J]. 学术探索,2021(11):1-7.
- [15] 师喆. 制度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J]. 党政研究,2022(1):5-12.
- [16] 冯仕政. 共同富裕与国家治理: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到社会政策[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01(9).
- [17] 王姣. 以农村农民为重点扎实推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J]. 农业经济,2023(11):78-81.
- [18] 刘顿. “真实共同体”的价值理性观照:共同富裕的公共性意蕴及其意义[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6-29.
- [19] 赵珊. 改革创新治理体系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N]. 中国经济时报,2021-12-06(A2).
- [20] 黄晓娟.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概念的历史溯源与语义变迁——以党的历史文献为中心的文本考察[J]. 社会主义研究,2023(5):1-9.
- [21] 孔兆政. 中国式共同富裕的正义镜像[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1-37.
- [22] 郁建兴,刘涛. 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J]. 政治学研究,2022(5):3-12,151.
- [23] 黄海燕. 基于社会质量视角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23(10):42-49.
- [24] 邹红,杨晗硕,喻曦.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测度指标体系——基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协同发展研究[J]. 经济学家,2023(10):23-32.
- [25] 吴忠民,江立华. 发展社会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 [26] 唐任伍,李楚翘.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49-58,2.
- [27] 刘涛.共同富裕治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J].治理研究,2021(6):22-32,2.
- [28] 谢华育,孙小雁.共同富裕、相对贫困攻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上海经济研究,2021(11):20-26.
-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1] 江必新,王红霞.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基础与关键[J].法学杂志,2019(2):52-60,140.
- [32] 张文显.法治是共同富裕的制度资源[J].法治社会,2022(3):1-9.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36] 陈雪,王永贵.全面把握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理与路[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48-57.
- [37] 高帆.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5-17,115-116.
- [38] 辛向阳.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观[J].新疆社会科学,2022(1):1-7,146.
- [39]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 [4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41] 乔惠波.试论共同富裕的内涵、基础及推进路径[J].东岳论丛,2022(2):21-29.
- [42] 陈燕.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理论演进与实现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21(3):115-120.
- [43] 张占斌,吴正海.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进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39-48.
- [44] 何雪松.迈向共同富裕:社会想象、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N].社会科学报,2021-10-14(3).
- [4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6] 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J].政治学研究,2020(1):102-111,128.
- [47] 陈柏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的领导”理论[J].法商研究,2021(3):3-11.
- [48] 张铮,何琪.从脱贫到振兴:党建引领乡村治贫长效机制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1(11):37-42.
- [49] 陈培永.中国改革大逻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50] 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1]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2] 宋群.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及评价指标初探[J].全球化,2014(1):35-47,124.

- [53] 唐任伍,孟娜,叶天希. 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 改革,2022(1): 16-27.
- [5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6] 何显明. 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J]. 浙江学刊,2022(2):4-14.
- [57] 张师伟,孙亚亚. 共生与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平等与共同富裕[J]. 浙江学刊,2019(4):92-100.
- [5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59] 仲超,林闽钢.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12-120.
- [6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1] 高燕,诸竹君. 走向共同富裕:浙江的实践与创新——第六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综述[J]. 浙江社会科学,2022(6): 152-154.
- [62] 刘琼莲. 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改革,2022(8):87-97.

(责任编辑:王佳)